



岭南社科名家文丛

高齐云

自选集

GAO QI YUN ZI XUAN JI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高 步 云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高齐云 | 自选集

GAO QI YUN ZI XUAN JI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齐云自选集/高齐云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12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岭南社科名家文丛)
ISBN 978-7-218-05608-1

I. 高… II. 高…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9137 号

责任编辑	陈启方
封面设计	张力平 吴德灏
版式设计	虹 峰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0.75
插 页	2
字 数	388 千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5608-1
定 价	62.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q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q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04 37579695】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主 任：林 雄

副主任：蒋 斌 陈俊年 黄尚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桂科	朱仲南	刘 蔚	李子彪
李夏铭	张小杰	杨以凯	陈海烈
林海华	金炳亮	曾少华	颜泽贤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

主 任：颜泽贤

副主任：梁桂全 蒋述卓 李 萍 王国健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仲兴	王利文	田 丰	叶汝贤
刘少波	张小杰	李恒瑞	李新家
陈长琦	陈海烈	陈鸿宇	苏立功
肖海明	陆家骝	罗必良	金炳亮
唐钰明	黄尚立	扈中平	蔡 禾
廖小健			



高齐云(1933—2005)

1933年2月出生于江西吉安。1951—1955年就读于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免试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师承中国古代文学的著名专家王起教授。1956年因被选拔为留学苏联候选人而提前毕业。1960年出任复办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师。1961—1962年间，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修学期满后，返回中山大学哲学系继续任教，直至2005年8月病逝。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称号。

主要学术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社会主义问题，并涉及人道主义问题、道德理论以及美学等领域的研究。先后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10多部。

出版说明

2004年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省委、省政府贯彻中央精神，随后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决定》。这两份文件极大地鼓舞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启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作为贯彻落实两份文件精神的一项重大举措，2005年9月19日，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的全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工作会议上，隆重颁布奖励1992—2003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2004年度国家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以省政府的名义奖励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在广东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次评奖中专门设置了一项“特别学术成就奖”，18位年逾七旬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获此殊荣，他们是：张磊、曾牧野、张江明、王琢、梁钊、夏书章、陈锡祺、蒋相泽、吴宏聪、端木正、李锦全、高齐云、黄天骥、黄德鸿、赵元浩、曾近义、汤在新、桂诗春。这些老专家学者德高望重、成果卓著，在各自专业领域成为学科带头人、领军人物，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得到这样的荣誉，应该说是众望所归。

就在这次会后不久，省委宣传部主持召开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会议，决定编选

18位专家的自选集，由省社科著作出版基金全额资助出版。这就是《岭南社科名家文丛》的由来。这些专家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要以一本书的篇幅，展现其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成就，并不容易。很多专家在多个领域均有所建树，一些专家同时撰写多种体裁的文章，有的还发表过外文论著。因此，我们与专家们达成共识，遵循以下原则编选：（一）每本书的篇幅约25万字，一方面体现精选精编的精神，一方面也使读者买得起。（二）只收论文和少量演讲稿、调查报告，不收中外文专著。（三）只选本人最有专长、最具影响的专业文章，不收其他领域的著述。（四）为保持本原特色、历史轨迹，所有文章原则上不做修改，但注明发表时间和原载报刊。（五）为方便读者阅读，对入选文章进行分篇类辑。（六）每人以第一人称撰写一篇学术自传，以展现其求学历程，总结其治学经验。

18位专家大多年岁已高，有的行动不便，有的卧病在床，但他们都对编选工作极为认真，大部分专家亲自动手编选文集和撰写学术自传，有的专家与出版社的编辑反复商量斟酌，其认真态度、严谨作风，令人敬佩！为了抢时间，赶速度，我们尽量抓紧编选和编辑出版工作，还在第一时间为18位专家拍摄了肖像照片，但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高齐云、蒋相泽、端木正三位先生驾鹤西去，没能等到书的出版，我们留下的影像竟成为最后的资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原定18种书整套一次性出版，现改为分期分批推出，完成一批推出一批。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成立于1997年，是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具体运作的一个评审、资助社科著作出版的机构，每一到两年评审一次，每次评出省内专家学者撰写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十余种。基金成立以来共评审和资助出版著作百余种，其中30多种图书荣获省部级以上各种奖励。这次集中资助出版省政府表彰奖励的18位著名专家的个人自选集，可以说是基金资助出版的一次创新。

丛书以“岭南”冠名亦有寓意所在。因为“岭南”已不仅仅是地域的概念，而且具有文化的意蕴。在当前形势下，岭南文化为我们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大省、法治社会、和谐广东，必将注入新的活力。为此，我们组织出版“岭南系列”，包括《岭南博士文丛》、《岭南社科名家文丛》、《岭南文化大讲坛系列》等等，力求打造成为文化大省建设中的一个文化品牌，希望得到社科界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参与。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
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2007年3月5日

学术自传： 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教师，最初并不是我的自主抉择，而是一系列外部事件所影响造成的。

从少年开始，我逐渐养成了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学的喜爱。我的故乡江西吉安，古称吉州、庐陵，历史上名士辈出。我幼年时，就从长辈那里听到欧阳修、文天祥的故事和诗词。先母李凤娥出身江西吉水的一个大家庭，她常带我去探望娘家的亲人。当我读小学时，就在那里看到陈岳修撰的《唐书》、欧阳修撰的《新唐书》和他的《欧阳文忠集》、杨万里的《诚斋集》、文天祥的《文山先生全集》等，并且阅读了其中的一些篇章。故乡先贤的风范和他们优秀的诗文，给我留下了不灭的印象。先父高华生是位商店店员，远在外地工作。但他关心子女的成长，回乡探亲时往往带来一些新书，其中就有鲁迅、茅盾、巴金等的著作。这些现代中国文豪的名著，也培育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喜爱。小学毕业

^{*} 本文原为高齐云教授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中的自述。这里略有删节，并改了标题。

后，我考入江西省立吉安中学。学校校址吉安白鹭洲，是1241年由南宋名士江万里创办的“白鹭洲书院”旧地。这独特的氛围，更燃起我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一有机会，我就沉浸在图书馆的诗集史书中。可我在此仅读完初中一年级，便随父母迁居湖南衡阳。但是，住地的变化以及1949年的解放，并没有改变我对中国文学的喜爱。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我就购买了莫斯科出版的《列宁文选》和《论列宁主义基础》来阅读，但这种革命的追求并没有排挤我心灵中的爱好。高中学习时期，我的班主任马积高老师和语文课主讲吴容甫老师，除了鼓励我政治上进步，还引导我开始了对中国文学的理性了解。从湖南衡阳市立第一中学高中毕业，我如愿考入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在1951年秋至1955年夏的本科学习期间，先后得到詹安泰、王起、黄海章、楼榭、容庚、高华年、冼玉清、董每戡等教授的亲切教导，帮助我汲取了关于中国汉语言文学的系统的理论与基本知识，掌握了在这方面进行独立研究的技能与方法。对中国汉语言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宝库的浩瀚、丰富、瑰丽、多彩的领略，更加深了我对它的喜爱。在詹安泰、王起教授的指导下，我的毕业论文《论李白的诗》获得优秀成绩。其中的一部分——《论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并被选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李白研究论文集》（该集从“五四”时期起至1962年6月公开发表的上百篇研究李白的学术论文中选辑33篇）。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对中国文学的喜爱，已建立在对它理解的基础上。本科毕业时，王起教授免试录取我攻读他指导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这一

切，为我深入中国古代文学的殿堂开启了大门。

正当我攻读研究生时，出现了我意料不到的事件，开始影响我学习发展的轨迹。当时，中山大学正筹备复办在院系调整中被合并的哲学系，计划选派合适人员赴苏联留学，学习美学，以便日后回校任教。有关领导找我多次谈话，希望我接受这个任务。我听后思想十分困扰，感到难以抉择。一方面，我爱好中国文学，在学习上取得了优秀成绩，只要在导师指导下刻苦钻研，必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赴苏留学是当时大学青年热切向往与追求的，我自然也是这样；同时我在学习、研究中国文学的过程中，认识到要在学术上有大的提高，必须系统学习、深入掌握美学理论，留苏学习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我处在两难的境地中：坚持研究中国文学，就失去争取留苏的机会；要把握争取留苏的机会，就得放弃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经过反反复复的考虑和征询师友、亲人的意见，我设想留苏学习美学后，可在日后的教学、科研中，将重点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结合起来，即把工作需要和个人爱好结合起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同意提前毕业，于1956年7月告别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但是，意料不到的事件接踵而来，使我的发展轨迹出现了更大的转折。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很快变为反右斗争，担任复办中山大学哲学系筹备工作的几位重要教师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复办哲学系的事一时告吹。二是中苏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影响了派遣留苏生的部署。1957年，我到教育部高教一司请示时，有关人员说综合大学除理科不得不继续派遣留苏生外，文

科一般不再派出留苏生。这种情况，既排除了我留苏学习美学的需要，又堵塞了留苏学习美学的可能。组织上从工作需要出发，让我留在哲学教研室担任公共哲学课教师。我虽然表达过回中文系的愿望，但最终只有服从组织安排。这样，我就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的教师。出于工作责任心和荣誉感，我努力加强自学，竭尽所能地搞好教学。而对中国文学的喜爱，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1960年秋，中山大学哲学系正式复办和招收本科学生，我也转为哲学系教师。在当时中苏分歧全面化和公开化的情况下，留苏学习美学当然全不可能。可喜的是1961年至1962年间，我有机会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进修一年。除了学好规定的课程外，我还去旁听、学习了有关美学的课程。从肖前、徐琳、庄福龄等老师的讲课中，获益良多。回到中山大学哲学系后，我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同时，还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课程。我希望把美学研究与中国古典文艺研究结合起来，作为日后学术发展的主攻方向，以实现我心中长久的爱好及意愿。但是，很快发生了所谓“教育革命”，从哲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中革除了美学课程。我想在学术上自主发展的努力，又一次被打断了。紧随而来的是所谓“文化大革命”，这股狂潮不仅完全打乱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正常运转，把国家推到崩溃的边缘；同时把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扭曲的虚假的东西充分暴露出来，并且推向极端。在这股狂潮中，一方面，我和许多人一样，被它裹挟而盲动；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增多和日益荒唐的言论、事件，我也用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观点，去进行对照、分析，以求

得正确或比较正确的认识。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思想上深入、全面的总结和思考，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1978年至1980年间，我在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期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通过不同的方式，与黄枬森、庄福龄、马绍孟、施德福、余其铨、金顺尧、余源培、孙伯鍈、胡福明、余少波等专家学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共同研讨，互相切磋，使我得以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深入地独立地思考，逐步地从思想上消除了以往僵化的扭曲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新的科学的理解。了解要完整地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首先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研究着手。可以说，这是我在思想上自觉实行的转折。在这个从不自觉到自觉和由浅入深的探索过程中，我认为关键是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重要问题。

一、清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式 与神圣化的曲解，恢复、发扬其 科学的、批判的本质

我最初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在大学本科学习《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时。该课程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教材，这本书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时公认是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最好的阐述。稍后，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其名称就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采用苏联学者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教材，其内容、结构大体同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一致，只是把认识论从唯物主义部分中分割出来，与辩证法、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并列，成为“两大主义”和“四小块”的结构模式；至于精神实质，更和斯大林的书完全一致。到1956年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工作时，已经有了中国学者编写的有关教材，中国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材基本上是苏联有关教材的翻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接触、使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材，都给我留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条化、神圣化的共同印象。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与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期，就明确地提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①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当他们创立的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指导地位时，他们更反复地强调不能把他们的理论当做“现成的公式”^②和“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2页。

条”^①，而应当看做是“研究历史的指南”^②、“行动的指南”^③。恩格斯特别批评了当时侨居美国的某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德国人的教条主义错误。他指出：“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④

但是，虽经马克思、恩格斯的反复的批评、阐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现象并不可能完全绝迹。因为它不仅仅是简单的认识现象，同时更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既有悠久的历史因素的影响，更有深刻的现实条件的作用。在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国家政权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占统治地位和具有指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如果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人物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物处理不当，就会产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倾向，甚至使教条化恶性膨胀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圣化。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来，在斯大林执掌苏联领导大权前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倾向又突出起来，并且进一步推向神圣化。对此，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某些相关的活动来看。当然，斯大林在领导建设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捍卫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上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

立了历史的功绩，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在理论上武装干部等方面发挥了历史的作用，这些都是不应否定的。但是，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条化、神圣化的始作俑者的错误，也必须给予应有的批评。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主要有两大“创造”。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与政治混同起来。《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在论说某个哲学观点后，往往直接地简单地引出一个政治结论，并把它公式化。例如，在论说世界的不断运动、发展后，即引出结论：“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①这一政治公式把“向前看”与“向后看”绝对地对立起来，本身就是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典型。与此相类似的公式，《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还提出了许多条。这样从哲学观点直接引出政治公式，就把哲学与政治简单地等同起来。其实，早在1930年12月批判德波林时，斯大林就亲自肯定德波林在哲学上的错误是“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把哲学问题和政治错误完全混为一谈。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这种“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的公式，实际上发挥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变成教条，另一方面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推向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1页。